

學位論文目錄

趙慶華

收錄範圍涵蓋97年度下學期至98學年度上學期通過論文考試，獲頒學位與台灣文學相關之碩博士論文（含在職專班、進修班），共收錄博士論文25筆，碩士論文307筆。本年度亦針對博士論文撰寫摘要，學位論文目錄則依學校、科系、作者筆畫排序列出。

博士論文摘要

台灣現代詩中的《莊子》接受與轉化

丁旭輝，中山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龔顯宗

本文援用「接受美學」理論，研究1949-2008年間，《莊子》如何影響台灣現代詩的發展軌跡並使其凝聚獨特價值。

研究者從台灣現代詩中語出《莊子》典故的「魚」與「蝶」意象入手，認為出現在現代詩中的鯤鵬大魚、涸轍之魚、相忘江湖之魚、鯀魚、鮒魚等各種「魚」的意象，潛藏有「詩人的自我隱喻」與「時代的苦難印記」等意涵，與其相對應者，乃是「忘我美學」；而「蝶」意象則被視為「形體的解脫與新生的喜悅」和「實我的體認與隔世的追尋」的象徵，為變型功能與「物化美學」的反映。由此，他進一步析論忘我美學與物化美學在《莊子》中作為美學樞紐的關鍵地位——這兩種美學觀不僅解決了《莊子》「以物觀物」中「我」的去處，同時也是「自然齊物」的前提。在掌握了魚、蝶意象的原型意義與象徵體系後，台灣現代詩人透過作品的實踐，將忘我美學與物化美學加以結合，逐步發展為面對現實苦難時的心靈解藥、面對宇宙自然時用以體現萬物一氣的自然生命美學，以及面對物我關係時無我之境的觀物美學。藉由對《莊子》的接受與轉化，

台灣現代詩人透過古典傳承開創了時代新貌，營造了當下與未來整個台灣現代詩、乃至現代漢詩的新美學，因而產生詩藝的新境界與詩學的豐收。

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展——從黃凡、平路、張大春與林耀德做文本觀察

王國安，中山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龔顯宗、蔡振念

本文藉由分析比較台灣後現代小說的代表性作家：黃凡、平路、張大春、林耀德的創作歷程，勾勒出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展脈絡。

研究者指出，台灣後現代小說的源頭可追溯至1980年代中期，其之所以於彼時發軔，主要是應對鄉土文學質變後所遺留的問題，同時延續現代主義文學在台灣所建立的藝術本位、重視技巧的文學傳統，此一觀點可由黃凡、張大春、平路皆有創作鄉土文學的背景以及林耀德藉由都市文學延續現代主義文學傳統得到印證。1980年代的台灣社會正處於各種價值觀大破大立的轉型階段，新世代作家亟欲尋得嶄新的敘事模式，因此紛紛進行大量小說實驗，各種條件的集結為後現代小說打造了有利的土壤。不過，由於後現代主義在台灣移植色彩太濃，並一味地走向形式至上的技術展演、甚至演變為另一權威中心而有違其核心價值，凡此種種均成為其發展的屏障；當小說

家們察覺此一現象，便轉而將對政治、社會的關懷置入作品中，直面台灣現實，以解決形式與內容比重失衡的問題；此一路徑，為後現代小說找到了轉型的出口。

1990年代後現代小說的轉型與延續，主要建立於邊緣族群「主體重建」的集體欲求，其形式技巧的創新實驗仍方興未艾，內容上則建立了開放、流動的規則，整體風格顯得更為自由、多元、豐富。研究者將平路的女性文學、黃凡的政治嘲諷、張大春的筆記中國作為台灣後現代小說整體風格轉變的佐證，由此申論後現代小說不但未曾消失，反而在轉型成功後成為台灣文學的主流。

施梅樵及其漢詩研究

林翠鳳，中山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龔顯宗

本文主要研究施梅樵（1870-1949）的生平經歷及漢詩創作，分別從生平家族考述、詩壇交遊網絡、文獻蒐錄鑑別、文本綜觀類論、特色主題探析等面向加以鋪陳。

研究者經文獻閱讀與田野調查資料訪得施梅樵位於鹿港的可能居處，同時透過戶籍記載查知詩人家族四代成員的家世背景，建構出對詩人家世和生平的真實認識，並提供足與書面文獻互補的珍貴史料。進一步則是耙梳施梅樵在台灣詩壇的交遊情況，釐清其如何以漢文教學為業，並勤走於各詩社之間，廣結詩界因緣，藉此推廣、傳承其延續漢文的理想，對台灣詩壇產生一定的影響力，由此反映日治時期的民間詩人與詩社超越個人侷限，展開漢詩書寫生活化、社群網絡緊密化的建構，成就傳統詩歌的巔峰發展。擁有詩壇祭酒地位的施梅

樵，極重視著作的意義和歷史評價，將其視為名山大業，千秋盛事；其創作的重要推力在於江山之助，強調寫景貴在「傳神」，主張「神重於形」；早期才氣充沛，詩風偏豔，中期風格趨向悲慨，晚期筆觸雙軌並出。至於寫作主題則包括遺民傷痛、賡和酬唱、風月沉醉、遊仙寓託等，此亦為日治時期台灣詩人們的常見題材，可謂兼具個別性與普遍性，同顯時代性與社會性。施梅樵一生的漢詩創作以《捲濤閣詩草》為巔峰代表作，最能彰顯其天份才氣與後天學力之成就。

「五四女作家」小說之愛情書寫研究

楊雅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蔡振念

本文以陳衡哲、廬隱、蘇雪林、冰心、凌淑華、馮沅君、石評梅7位「五四女作家」小說中的愛情書寫為討論文本，試圖回答：面對因重視「自由戀愛」而使當時女性陷入複雜處境的五四社會，女作家們如何藉由小說書寫回應女性在現實生活中所遭遇的愛情壓力？

研究者認為，五四女作家小說中的愛情論述，乃以「爭取婚姻自由」為主要議題，探討其建立在國族論述上的愛情認同、困頓於母女關係中的角色衝突，以及暗伏在異性婚姻制度下的女同志心聲；而「探索性別主體」則是女作家們書寫時的重要思想脈絡，出於對不同女性的關切，她們不僅對五四愛情神話提出質疑、試圖顛覆五四愛情神話的勇者形象、關注女性性別主體的自我實現，同時也嘗試重建五四愛情論述的現實基礎。若從愛情場域、性別角度、文學歷史三方面來看，五四女作家小說愛情書寫中的女性聲音一方面具備了超越

五四時期愛情論述的現代性想像、回應五四社會女性角色衝突的主體性建構等特色，另一方面，也擁有立足五四／女性文學史的歷史性價值。因此，五四女作家小說中的愛情篇章並不僅是女性閨秀心事的呈現，更是女作家得以在女性角色仍被賦予諸多新舊矛盾期待的社會中為女性發聲的重要媒介；換言之，小說中女性人物所經歷的愛情之爭，實為女作家們為回應社會現實中女性的愛情處境而發動的性別主體之戰。

台灣古典文學系譜的多元考掘與脈絡重構

顧敏耀，中央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李瑞騰

本文透過特定研究方法的實踐、新資料的運用、區域／地方視野的帶入、特殊身分作家的考察、文學載體的探討、特殊歷史事件的分析以及文學選本的整理，以多元考掘的方式對於前行研究者的台灣文學史論述體系進行罅隙的填補，召喚重層／立體／複調的文學記憶，重新建構台灣古典文學發展的歷史軌跡與脈絡。

研究者使用微觀／細讀的研究方法，討論陳肇興詩作所運用的典故，破譯背後的文化符碼，並與相關歷史文獻進行相互比較，以體會其深刻意涵與言外之意。他也運用《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數位資料庫進行考察，發現其中蘊含多方面開展的研究潛力，具有高度價值。在地方／區域的研究視野方面，則是探討南投縣在清領時期所留下的膾炙人口之作，認為其足以藻飾山川、潤色鴻業。客籍經學家吳子光除在學術上卓有建樹，散文也論理清晰，見解獨到，將敘事、寫景和抒情熔為一爐；李

炳南的作品包括了流離經驗與思鄉書寫、反映時代環境、歌詠台灣風土人物，情感真誠、胸懷開闊。此外，研究者亦讓戰後女性古典詩人重新浮出地表；深入爬梳戰後古典詩作媒介特點、詩人背景與詩作內容的關係；討論《正氣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中首次出土的「二二八事變」文獻史料；最後，則是分析目前所見八種台灣綜合古典詩選集，包括沈光文、丘逢甲等人的詩文，以此重新審視典律生成的問題。

靜靜的生命長河——解嚴以來台灣女性散文之主題研究

溫毓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江寶釵

1990年代以來的台灣社會，隨著政治、經濟與文化領域的開放轉型，一元化權威的意識崩解，思想和言論也得到空前的自由，然而在此此起彼落的眾聲喧嘩中，女性散文作為一種「話語」，發出了什麼聲音？研究者以此為問題意識的核心，觀察到女性散文中「負面心靈」的版塊——女作家透過近似神經質、空虛、自瀆、絕望的書寫，呈現靈魂無助的狀態，以刺痛或扭轉慣性和惰性思維，用自我瘋狂的文字形象構築一齣令人寒顫的笑劇，寫出種種對「生命的質詢」。而女性面對日常生活和生命的書寫是「個體經驗」的表現，即生命體驗下的精神風格；她們擅長將文字點石成金，從而再顯出思維主體的精神品格，這使得女性散文的思維方式帶有濃厚的經驗性特徵。許多女性散文家將此化為一種對生命知性的體驗，經由感性人事物的觸發，昇華為理性的調節，最後訴諸哲理的意涵。這種敘事能夠在情感節制中超越現象本身，進行抽象的、哲學性

的思考，並力圖將散文從平凡庸俗的日常帶入光亮。例如張曉風、簡嫚、鍾怡雯、柯裕榮、胡晴舫、張惠菁等，便即善於將日常的眼光陌生化，汲取特殊的形式意義，從自我感性的表象化中深掘、探索，把握某種簡單卻普遍的概念，從而尋得出塵脫俗的救贖或解脫。

日治時期台北州漢詩空間之發展與研究

謝崇耀，中正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江寶釵

本論文主旨為探討日治時期台北州漢詩文化空間的形成原因以及各時期的發展情形，同時佐以具體實例，進一步解析該文化空間本體的發展邏輯與系統架構，以及其透過場域作用而與社會文化互動的狀況，乃至於本質特色等。

研究者認為，日治時期台北州漢詩文化空間的形成，大抵是該地區的社會領導階層集結資本所共同造就的成績；其發展過程包括鼎立其、擴張期、調整期，而「以詩為盟，大雅不群」則是形構此漢詩文化空間的基本理念，並透過組織活動與媒體活動，對整體社會文化產生積極影響，而在此同時，也因為必須適應社會，形成一種與社會積極互動的關係。除了以台北州整體漢詩空間做為觀察對象，研究者另以具有獨立歷史和地理地位的宜蘭街之漢詩空間做為範例，驗證並呼應文中所提出的論點；最後並以不同時期的類似空間，以及同時期台北州內的台北市與宜蘭街，和同時期全島之台北地區與台中地區的代表詩社進行縱向時間與橫向空間的比較，由此說明日治時期的漢詩空間是能夠適應新時代的文化空間，而全島各地的漢詩文化空間都受到基本的文藝性格所

約束，而發展出類似的內容與框架。據此，探討台北州漢詩文化空間的形成結構，也就能夠在相當程度上理解當時全島漢詩文化空間的基本發展脈絡。

搬演「台灣」：日治時期台灣的劇場、現代化與主體型構（1895-1945）

石婉舜，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所

指導教授鍾明德

本論文以通俗劇場為研究取徑，探討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台灣劇場如何隨著城鎮戲院的普及興建而步入現代化，以及殖民者、戲院經理人和知識份子各自懷抱特定目的，試圖主導戲劇活動發展的過程。

研究者指出，台灣的戲院首先是為了娛樂日人軍民而興建，之後，由於被視為殖民教化工具而日漸普及，統治者並創造出以台人觀眾為對象的「台灣正劇」劇場，藉以達到協助殖民統治的目的。

1920年代，「老歌仔戲」和包含正劇、文明戲、京劇與福州戲等流行戲劇彼此交會而形成歌仔戲，催生了近代享樂精神，也讓知識份子洞察到被遮蔽的殖民地社會現實，因而以「新劇」為重要啟蒙手段，展開對戲劇現代化的自主追求。當台灣總督府在1930年代採取激進的殖民地同化政策時，主管戲劇事務的警界人士積極介入戲劇發展，殖民地觀眾卻展現了主體的能動性，對官方施政形成反挫；而知識份子則利用歷史契機賡續新劇運動並重新定義「鄉土」。持續7、8年的劇壇混亂局面，最後在戰時官方的暴力性中落幕。

綜觀日本統治期間，殖民者數度製造符合統治利益的現代劇，意圖達到馴化台灣人並

形塑其認同的目的；充滿時間焦慮感的知識份子，在資源、經驗都有限的情況下，創作通俗化戲劇的道路崎嶇難行。於此期間發展出來的「殖民地新劇」，在語言上以混用台、日語為邊界、美學上呈現混雜性特徵，可說是台灣民眾與殖民暴力長期遭逢的最後結果。

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

王鈺婷，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

指導教授林瑞明、邱貴芬

本文從女性散文的抒情傳統與文化體制、生產建制網絡以及現代性三方面的關係進行討論，試圖釐清女性抒情散文在1950年代文學場域中的獨特位置，並從文學場域多重結構的運作，梳理女性散文與主導文化、文藝政策、市場機制以及文學思潮的交鋒，由此開拓1950年代女性散文多元嶄新的面向，呈現美文體系複雜的文學意涵與美學傳統。

研究者認為，戰後初期的女性散文美學基調所承載的價值來自於中國文化「抒情傳統的創發」，並從傳統文言中汲取養分，承接中國散文對古典的追尋；而這也透露出女性散文家如何參與由主流文化所主導的文化體制。女性散文抒情傳統的通俗美學型態，實乃處於一個複雜的「協商空間」，一是來自主流權力秩序的確認，二是文學消費市場的挹注，由此，「政治駕馭」和「市場主導」成為決定抒情散文在文學場域位置的關鍵因素。此外，研究者亦透過在《文學雜誌》發表作品的女性散文家張秀亞、林海音等人的作品，檢視她們如何將傳統審美價值與《文學雜誌》回歸中國文化的論述接軌。雖然女性創作者一方面與《文學雜

誌》的主流論述接合，但另一方面卻又以其眷戀舊文化的情懷譴責現代潮流對傳統／倫理的侵襲，導致其對「現代性」的想像逐漸與《文學雜誌》分道揚鑣，進而終於產生分裂。戰後初期女性散文家所內蘊的美學傳統寓意深長，與歷史變遷中的文化政治、文化工業的傳播形式等關係密切，也在台灣文學場域發揮了深遠的影響力。

殖民地風景的書寫：1930年代台灣白話小說文體風格研究

李敏忠，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

指導教授呂興昌

本文以1930年代的台灣白話文小說為討論對象，認為這些作品既代表了當時知識份子從事新文化運動的具體成果，在媒體上所形成的文體，更建構了台灣人自己定義的話語場域。而這場域所暗含的語文同一性，既是威脅殖民統治的同化基礎，也是1937年殖民當局促使各界自動廢止漢文欄的主要原因。

研究者指出，1930年代台灣知識份子的著眼點已由政治運動轉為新文化運動，這從當時報紙、雜誌、文藝社團的繁盛可見一斑。就當時的台灣白話文小說而言，受台灣話文論爭及左翼時潮的影響，其發表於報紙、雜誌等媒體上形成寫實、混雜而日趨成熟完備的文體風格；就其內涵來說，這些現代小說所摹寫的個體而內面的殖民地風景，實為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交融產物。不過，對於1930年代台灣白話文小說的混雜文體風格、語文同一性等現代意涵，戰後的文學研究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與詮釋；舉凡論及台灣「現代主義」文學，大多從1950、60年代談起。然則時至今日，

台灣文學研究已成為學術體制內的一門學科，諸多日治時期的文獻史料亦相繼出土，在此基礎上，本文研究目的有二，一為提供戰後現代主義文學研究的參照，另外就是借鏡西方固有的「文體風格即修辭」，以舉證1930年代台灣白話小說的殖民地風景中的現代意涵及作家的在地認同。

「鄉土」的尋索：台灣文場域中的「鄉土」論述研究

林中力，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

指導教授游勝冠

本文透過對「鄉土」概念史的研究，從連續性的角度觀察「鄉土文學」的變化過程，也梳理了為「鄉土」提供意義投擲與碰撞處所的三次「鄉土文學論爭」，並追溯「鄉土」與「現代」的辯證軌跡。研究者認為，在台灣文學的發展歷程中，文學的現代性既是「鄉土文學」的發生前提，也是其批判對象；而歷史上兩波「鄉土文學」高峰，都是對文學現代性的正面衝撞，然其衝撞的方式並非以決裂為方法，而是在面對「現代性」的橫向威脅中企圖從「地方」汲取資源，目的是在於以自身的方式躍入「現代」。研究者也進一步從「鄉土文學」在不同時代所面臨的現代性課題具體考察其所據以回應的在地資源，並分別從戰前與戰後不同的時代條件提出解釋架構——戰前的「鄉土」一方面描繪了台灣相對於西方、日本和中國的邊緣位置，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所屬」的意涵，其所宣示的是與文化他者之間的「差異性」，「鄉土文學」即指向從文學場域來探索並建構自身的文化特殊性，涉及語言標準化、文學的定義與台灣特殊性等相互關聯

的面向。至於戰後的「鄉土」則有兩大對話對象，其一是與「西方」的關係，也就是關注資本主義與工業化所帶來的社會劇變，在美學課題上，面對以西方為追趕目標的「現代主義文學」；其二是與「中國」的關係，也就是思考中國與台灣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文學上則是關於台灣文學史的建構問題。

台灣歌仔冊中「相褒結構」及其內容研究

柯榮三，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

指導教授呂興昌

本文以最富藝術性和吸引力的歌仔冊作品「相褒歌」為討論對象，透過對「相褒結構」內容與形式的分析，研究者首先指出，「相褒結構」除了用來做為情歌的表現，在歌仔冊中也能發揮穿針引線的敘事功能，其對話體裁是編寫故事的重要形式，至於要承載何種內容，則端看民間藝人（歌仔先）如何靈活運用。而「褒歌」之名雖與「相褒結構」的形式有關，但是運用「相褒結構」編唱的歌仔冊卻未必全都被稱為「褒歌」，由此歸結：「褒歌」是歌仔冊題名的一種「表現形式」，而「相褒結構」則是歌仔冊佈局謀篇的「內在形式」，兩者並無絕對關連。

此外，「相褒結構」雖然經常使用在「抒情」方面，惟此「抒情」誠如王育德所言，不僅限於「男女對唱」，目的當然在於向對方求愛的甜言蜜語；圍繞著「情」，歌仔先在編唱歌仔冊時，會運用對話鋪陳出巧妙的情節，除了男女情愛，通常也恰如其分地用以表述同性友人之間的患難真情。

在闡述了「相褒結構」在歌仔冊運作之理論後，研究者藉由考察以「相褒結構」敷唱

結義友情、外遇畸情、男女愛情等三類不同情懷的代表性作品，從中深入挖掘歌仔冊真正的藝術性與吸引力之所在。

戰爭前期台灣文學場域的形成與發展——以報紙文藝欄為中心（1937-40）

陳淑容，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

指導教授林瑞明

本論文以報紙文藝欄為中心，探討報紙漢文欄廢止後的戰爭前期（1937-40），台日文學者如何利用此文學傳媒的公共空間，進行言說、對話與互動。研究者使用日刊《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日報》、《台灣新聞》以及《台灣新民報》的文藝欄資料，分析四大報的立場、發行狀況、編輯策略與版面風格；並以《新民報》學藝欄編輯黃得時所推動的「新銳中篇創作集」為中心，討論翁鬧、王昶雄、龍瑛宗、呂赫若及張文環五位作家所創造的中篇小說，如何引領讀者的想像，帶動《新民報》學藝欄的文運，以銜接1940年代以後台灣文學活動的另一波高峰。本論文指出，「新銳中篇創作集」透過「圖畫」與「故事」的結合，經由新聞連載的小說敘事，創造一個雅俗共賞的想像空間。這個由編輯黃得時與作者、畫家共同開創的想像空間，振奮了事件後低迷的台灣文學活動，也為龍瑛宗所謂的「文學之夜」帶來一線曙光。本文作者試圖透過略顯瑣碎、細節的討論，對黃得時指出「沒有文學雜誌，也沒有文學活動」的「空白期」，或是龍瑛宗宣稱的「文學之夜」，提出一種新的詮釋框架。不管是「空白期」或者「文學之夜」，文學者以及文學活動之中必仍存有跌宕與起伏，因此吾人可以通過報紙文藝欄，觀察此時期的

變化及其複雜多樣的面貌。

「文藝大眾化」的三線糾葛：1930年代台灣左、右翼知識份子與新傳統主義者的文化思維及其角力

趙勳達，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

指導教授林瑞明

研究者認為，「文藝大眾化」的價值取向正是「另類現代性」的展現，因為它從被殖民話語貶抑的台灣人民與傳統文化汲取資源，轉化為抵抗殖民話語的論述與文學實踐。因此，本文將「文藝大眾化」視為1930年代的台灣文學場域中最進步的文學話語，並在此一原本被視為屬於新知識份子文學話語的詮釋框架中加入傳統文人的思考，試圖使1930年代台灣文學場域內部關於「文藝大眾化」的思維得以呈現出左翼知識份子、右翼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3種截然不同的風貌。研究者特別將傳統文人區分為「傳統主義者」（traditionalist）與「新傳統主義者」（neo-traditionalist），認為前者對現代文明抱持著食古不化的態度，後者則追求中西文化的調和，以維新傳統文化。因此就本文的詮釋框架而言，涉入「文藝大眾化」的三線糾葛之傳統文人，乃特指「新傳統主義者」，從1930年代的台灣文學場域來說，即是以連橫、趙雲石為首的《三六九小報》文學集團為代表。

由於「大眾」一詞本身所具有的歧義性，致使左翼、右翼知識份子和新傳統主義者對其進行各自表述，因而產生了本文所說的「文藝大眾化」的三線糾葛：即「文藝大眾化」的左翼內部之爭、左右之爭與新舊之爭。本文採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衡量三類知識份

子的文化思維與實踐活動究竟發揮多少「文藝大眾化」與抵殖民的效用，何者越能從「文藝大眾化」的取向體現人民的生活情感、建構民族認同、凝聚反支配的能量，便越能得到研究者的肯定。

日治時期台灣基督徒知識分子與社會運動（1920-1930年代）

王昭文，成功大學歷史學所

指導教授林瑞明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討論台灣的基督徒知識份子在日本東方式帝國的統治、「多重邊緣性」的殖民情境中，如何以基督徒身分運用基督教的文化資源進行反殖民體制的運動，以建立台灣自主意識。研究者以積極參與社會改革運動的基督徒知識份子蔡培火和林茂生為例，探討1920-30年代間，他們在政治、文化和教育三方面，既爭取現代化又同時保存本土文化的努力，以及基督教信仰與文化對其思想行動的影響。

研究者指出，在苦悶嚴密的殖民體制中，被殖民者的能動性極為有限，而基督教的文化資源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脫離殖民體制的可能性。以政治運動為例，因為有蔡培火在日本的基督教人脈而得以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而基督教的和平主義與仁愛教義不但可能是讓此運動局限於合法路線的原因之一，同時也促成蔡培火「互助共立」論述的提出。再者，由於台灣人渴望透過教育加速現代化，建立自主的教育機構，以擺脫殖民者的同化政策，因此爭取合乎台灣人需求的教育環境就成為社會運動中相當重要的訴求，在這方面有林茂生努力結合社會與教會資源，使台南的長老

教會中學一度可能成為「台灣人的中學」。至於文化運動，則有蔡培火等人推行基督教所使用的「白話字」（羅馬字），將其視為可以幫助一般大眾迅速吸收新文明的工具，近而可能發展為「台灣人」的文字。上述種種基督徒知識份子的努力，雖然在殖民統治的銅牆鐵壁前皆粉碎無效，但是藉由此些歷程，可以看到基督教文化資源為台灣知識份子「追求現代化」與「維護台灣性」的追尋提供了某種可能的實踐途徑。

台灣新戲劇研究（1965-1980）

陳美美，佛光大學文學所

指導教授馬森

1960年代的台灣正處於社會轉型的起跑點，當時的國內政局逐漸安定，經濟、社會也日趨穩定發展，但反共復國的國策仍使思想、言論受到高度箝制，創作自由亦有所侷限，促使知識份子與作家們努力尋求逸出官方控管的管道，將希望寄託於援引自西方的嶄新文藝思潮與創作方法。《自由中國》、《文學雜誌》、《現代文學》、《歐洲雜誌》與《劇場》的相繼出現，正標記著這樣一條尋求思想、言論與創作自由的道路；而創刊於1960年代的《現代文學》、《歐洲雜誌》和《劇場》同時也是台灣重新自西方引進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重要推手，此即馬森所謂「二度西潮」進入台灣的主要內涵。1965年，姚一葦選擇布萊希特「史詩劇場」既屬西方現代又富有中國古典風格的手法，以《孫飛虎搶親》一舉成功開創了台灣現代戲劇的新氣象；此後，各項中國傳統藝術的因子紛紛被融入兼具古典與現代、以西方戲劇手法所創作的作品

之中，帶動了為台灣現代戲劇創造新貌的風潮。馬森受荒謬劇啟發所創作的一系列具有荒謬氣息的獨幕劇、張曉風以史詩劇場手法創作的宗教散文詩劇與黃美序以諷刺喜劇的手法創作的意念劇等，皆對1960、70年代台灣現代戲劇由擬寫實反共劇走向與西方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同步的反寫實戲劇有重要貢獻。他們的實驗精神不僅影響了1980年代以後的台灣劇作家，更隨著中國大陸重啟西潮而擴大其力量。

台灣現代詩的浪漫特質

顧蕙倩，佛光大學文學所

指導教授陳鵬翔

本文以西方「浪漫主義」的質素與發展為理論架構，以中國文學「浪漫傳統」的流變為基礎，對照台灣歷史的動線，探討中國文學的浪漫抒情與西方浪漫主義結合後，如何在台灣社會進行對話、融合及產生衝突，逐漸形成具有台灣特色的現代抒情詩、寫實詩或後現代詩。研究者根據「抒情傳統」與「抗拒思想」兩大特質，以余光中、白萩、鄭愁予、楊牧、楊澤、夏宇、葉紅等人詩作為討論對象，勾勒台灣社會歷經多重變遷後呈顯於現代詩中的浪漫特質。

研究者認為，對於「浪漫特質」的探討，過去一向為台灣現代詩壇忽略，此一現象不僅是「浪漫主義」定義的界定問題，更是台灣現當代詩壇創作論與批評論尚待開發的現象反映；因此，她回到浪漫文學的源頭，釐清「浪漫特質」的核心，以探究台灣現代詩人創作的初衷與原始的感動；並於結論中指出，台灣現代詩具有以下4項浪漫特質：回歸自然，

實踐真誠美善；異國想像，為求現實超越；反抗現實，思考人類處境；追尋主體，拼貼身分認同。不過探討台灣現代詩的目的並不在於再現西方浪漫主義的場景，而是藉由西方對「人本」價值與「浪漫特質」的重視，檢視台灣現代詩人不斷翻騰的創造力與意志力；其承繼自中國傳統文學的浪漫精神，使台灣現代詩有別於西方浪漫主義，更表現出其獨特的深度。

乙未割台文學文獻研究

王嘉弘，東海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吳福助

本文嘗試全面性地進行文獻蒐集，探求乙未割台文學的作品文獻、評論文獻、歷史文獻和研究文獻，以完成「乙未割台文學文獻彙編」；並在此架構下，透過文獻學研究方法從乙未割台、鎮台戰役、甲午戰爭三種不同但又互有重疊的觀念、定義，重新評價這批彙編文獻的意義和價值。

研究者首先說明本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進而將「乙未割台文學」相關文獻史料從三個角度予以區別：「征台戰役文學」是由日本來台軍人、官員所創作的文學作品與日本國內依此事件為題材所寫就的新文學小說；中國現代文學評論家阿英則此事件視為國恥，站在反侵略的立場將相關作品界定為「甲午戰爭文學」；至於本文作者則是從台灣本位主義出發，以「乙未割台文學」稱之。此外，並分別就「乙未割台傳統文學內容類型」、「乙未割台文學相關歷史背景文獻發展」、「乙未割台文學研究文獻的發展」、「乙未割台文學文獻的相關議題討論」等子題進行申論；研究者指出，乙未割台文學文獻研究自日治初期迄今，

多著重於「詩文證史」的作用，但就文學文獻本身來看，還有相當多的議題值得深入探討，例如此類文學作品經歷了「激憤」、「勵志」、「哀傷」三段變化，或是晚清小說中出現了以此為背景的「劉永福現象」、日治初期傳統詩文中的「鄭成功現象」等。

台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述（1950-1987）

侯如綺，東海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陳俊啟

本文從「離散」觀點切入，討論1950至1987年間外省作家小說中以離散來台經驗為主題的作品。

研究者指出，在1970年代以前，離散來台的外省作家主要是以道德文化信仰面對價值斷裂的危機，增進離散者與在地居民的凝聚力，從而定位自我捍衛的傳統價值；進入1970年代之後，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場域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外省族群在台灣社會裡的身分位置開始遭到質疑，小說家們遂於此時紛紛塑造出有別於英雄、貴族的人物，而改以建構渺小、卑微的外省人形象。

本文也觀察到，第1代與第2代外省作家所採取的敘述策略有所不同：第1代作家主要是以呼喚民族主義的方式來統合差異，強調血緣與團結的重要；至於第2代外省作家在面對外界的挑戰時，多半表現為不確定且充滿疑慮。此外，透過對小說中兩代離散者契約結構的分析，研究者發現，作品中有關家的尋找、回歸或出走等敘述，反映了兩代外省人離散經驗的延續與差異。在以父子關係為主導的中國家庭裡，作品中的父／子除了是文化心理的

反應，也隱喻著家與國的聯繫關係；因而這些小說不僅是用以強調兩代離散者的集體歷史命運，也是作家們將其反省與希望延伸至未來的寄託。

流行文化與文學傳播——《皇冠》研究

葉雅玲，東海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洪銘水、應鳳凰

本文主要探討台灣歷史悠久且迄今仍持續發行的文藝雜誌《皇冠》如何在主編平鑫濤帶有上海現代性色彩的編輯意識下，發展出「商業」、「入世」及「多變」的特色。研究者基於接受美學主張「文學能力」左右讀者審美意趣的觀點，從文學傳播和流行文化兩方面進行申論。首先將刊物從創刊號迄660期依據經營策略之不同分為西化風尚時期、雅俗兼備並匯聚通俗文學大家時期、延續通俗特色及培育文壇新人時期、標舉推廣大眾文學時期、以推理小說向日本、東南亞、中國大陸發展時期；並分別論述《皇冠》中的流行文化元素，包括流行文學、廣播、以及視覺傳達好萊塢電影、瓊瑤影視、封面設計、攝影、繪畫、插畫和漫畫等；此一重視視覺文化帶來的閱讀新體驗，正符合詹明信所指後現代社會文化模式的特點，也說明了當代社會正轉型為視覺影像文化的社會。而該刊之所以能夠長久屹立，外在因素是由於企業經營本身，挾發行雜誌、出版圖書、發行人兼任副刊主編等多重文壇佔位，亦跨媒介經營廣播、電影、電視及畫廊、劇場、舞團，多角化經營使其成為文化工業兼文學發展的強勢傳播媒體。至於內在因素則是除部份專欄廣納華入圈百變更迭的社會現象，吸引讀者外，張愛玲與瓊瑤現象也為它帶來雅俗

融混／超越的趨勢。使該雜誌成為眾多華人作家成名之處，同時培育無數文壇新人，藉由多元文學傳播方式帶動文學發展。

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

李文卿，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廖炳惠、黃美娥

本文以1937年至1945年間的「中日戰爭」、「大東亞戰爭」期為時間座標，擇取五個漢字使用區域——台灣、朝鮮、魁儡政權：滿州政權、中國華北、中國華東為空間座標，考察大東亞共榮圈下的東亞經驗、記憶、文化與歷史交錯的問題。試圖從「跨界」的視域進行東亞文學與文藝體制的研究討論，探討大東亞共榮圈的概念及其欲形塑的東亞文學觀，以及各地域對此文學建構所衍伸的知識、權力、文化關係的接受和質變。

從日本因應戰爭的動員過程及帝國主義思潮的發展脈絡，可以窺見日本企圖藉由國家機器的運作，在內地、殖民地和佔領區中塑造「共同體」之想像，並由此打造「大東亞共榮圈」的東亞一體翼贊結構。而各地域對於「共榮想像」自有其相異的對應態勢，從中可以看到大東亞文學圈中文學者認同的游移，以及在不同統治模式下所衍生的不同「協力」圖像。大東亞的文藝運動可以說是日本國家主義發展的延長，包括文學者統合團體的誕生、筆部隊的派遣、報國文學的創作乃至於徵用作家的紀行報導，皆受到國家機器的操控。「八紘一宇」支撐了日本的國體論述，在各個地域中並以日語教育代替血緣聯繫，利用語言形構「東亞民族」的一體性，同時透過各地日本文學者

有關戰爭文學、勤勞文學、增產文學、國民文學等各文類的書寫模式與生產過程，從不同角度展現帝國想像，顯現大東亞的視野，並各自展開「文學共榮」的命題。

南方作為帝國慾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

邱雅芳，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陳芳明

本文主要探討明治中期以降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聚焦於具有象徵意義的代表作家，包括1910年代的竹越與三郎、中村古峽，1920年代的佐藤春夫，1930年代的中村地平、真杉靜枝，1940年代的西川滿與《文藝台灣》，以其所撰寫的小說與紀行文體為討論對象，企圖以再閱讀和再詮釋的方式，探討日人作家所形塑的南方憧憬，進而解構其建構或虛構的南方敘事。

研究者指出，日人作家的「南方」觀點，除了帶有異國情調的幻想，也投射了強大的帝國慾望；檢視其南方書寫的內涵，可以發現其中經歷了3個階段的衍變：從領台初期混沌未明的南方憧憬階段，借助各種文化與帝國論述的傳播，逐漸成文日本人集體的政治無意識，在戰爭期間演進為日本帝國的強大意志。台灣作為被觀看的南方客體，透過各種話語敘事，從模糊概念而逐漸顯現清晰的形體。到了南進政策明確的階段，「前進南方」不再是潛藏在個人內心的集體無意識，而成為昭然若揭的意志、隨處可見的口號。就東亞文學與後殖民主義的觀點而論，日治時期日人作家台灣書寫的發展，具有複調的文化意涵；這些帶有豐富暗示的帝國文本，和日本從明治時期以來

的南進論述，以及昭和時期的大東亞共榮圈構想，在政治對文學的動員關係上形成深刻的影響。南方作為帝國慾望的一部分，逐漸在文學上形成一條「南方」系譜，帝國的政治和文化之間的聯繫誠然極其貼近。

「探求者」作家群文學困境論——一個「右派」作家群的歷史、社會與美學考察

黃文倩，淡江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呂正惠

本文以中國大陸「雙百」期間（1956-1957年）出現的同刊物與作家群「探求者」為對象，結合社會、歷史與美學的詮釋方法，討論此「右派」世代作家群與俄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傳統、毛澤東文藝傳統間的接受關係，並進一步分析造成其各階段文學困境的創作立場、世界觀、社會主義經驗等歷史生產基礎。

「探求者」兼有五四知識份子的啟蒙立場，以及毛「講話」以降的人民姿態，此種「雙重姿態／立場」的混合及消長，左右了他們的創作基調。在1950年代中期，他們將教條化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解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可能性本身」，混淆了某種文學觀念的可能性、可建構性與歷史實踐性質的差異，也影響了他們的世界觀。改革開放後，他們對文學淵源的典範學習，有更寬廣的古今中外兼收的眼光，而在選擇材料、處理題材、塑造人物、運用語言時，亦能透過豐富口語的白話，對「生活整體性」進行探求，1978-1984年因而成為「探求者」及「右派」世代創作的高峰，具有相對較高的文學成就、公共視野與史料認識意義，值得學界重新重

視。1985年以後，「探求者」的文學創作，有愈來愈明顯的實用主義色彩，並受限於經驗性的價值感，在去政治化的運動性綜合作用下，作品中的感情、公共視野和力量則趨於弱化、窄化、且偏重於抽象。

1920-1937台灣新知識份子思想風貌研究

蘇世昌，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所

指導教授呂正惠

本文試圖透過整理、分析、統計日據時期知識份子在報章雜誌發表的文章、言論，並以民族主義為軸心，發覺知識份子豐富的思想內涵及其轉變。由於知識份子身為文化啟蒙、社會運動的意見領袖，足以在公共領域發聲，並扮演社會精神文化建設的指導者，因此藉由爬梳其言論，可窺知社會文化趨向，有助於後人理解當時的社會氛圍，釐清各階段焦點議題對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影響，掌握台灣文化的內涵與特質。研究者分別從漢文化的捍衛與凝聚、文化啟蒙、政治權利的追求、大眾文化與社會主義思潮等面向切入，討論知識份子漢族文化認同的形成、知識份子在白話文運動與新舊文學運動上對於文化普及的努力、民族運動的地方自治理念對知識份子民主觀念的影響、重視無產大眾利益的社會主義思潮如何在文化上發展出以大眾為對象的訴求。其於結論中指出，新知識份子在殖民統治的強大壓力下，根植於台灣現實的思想，展現了兩歧性與多重風貌，除了激起強烈的民族意識之外，亦關照傳統、本土，企圖保存、復興漢族文化，同時受西方個人主義、民主法治、社會主義等思想影響，以具體行動追求台灣的現代化，並

以之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同化政策，爭取社會、民族的平等，企圖跳脫日本壓迫，尋求台灣立身於國際社會的可能。

差異的美學——女遊書寫、女書與女性譜系書寫策略研究

吳婉筠，輔仁大學比較文學所

指導教授簡瑛瑛

本文以華裔美國女性與海外移民／世界華人（文）女性作家聶華苓、嚴歌苓、馮麗莎、郭小櫓、譚恩美五人為研究對象。作者認為，華裔美國女性文學十分清楚地展現出書寫模式、生命體驗、文化語境等多重差異性，而此種差異不僅得以擴充比較文學研究範疇的深度與廣度，也將女性書寫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模式、女性獨有的文字感性，以增添更豐富多元的對話性與延展性。

研究者指出，「他者話語」及文化敘事對於華裔女性作家而言是相當重要的書寫和化與模式，由於身處異域文化語境、加上在兩個世界之間的生存體驗，從性別和種族兩個層面來看，她們既是男性的「他者」，也是異文化的「他者」，其書寫因而呈現出不同於主流的話語模式。她們同時會藉由對現存語言和文字的創造性改寫、諧擬、挪用、翻譯，並在話語中加入族裔文化傳承，表達若即若離的反抗性意涵。家族／國族歷史、女性思與、生存體驗是華裔女性「他者話語」以及文化敘事中不斷重複出現的主題，女性藉由寫出「她」的故事，經自己和主流文化、歷史並置，在試圖還原遭到抹消的歷史過程中把女性的內心感悟抒發出來。透過性別、種族、語言、文類等多重差異的視角，擺脫「他者」、「標籤化」的本

質主義二元對立觀點，或許更能了解女作家不同的介入策略，從她們的文本實踐剖析其美學意識與生命觀，才不至於陷入形而上或本質論的陷阱。